

美雨与中土

1922年学制改革与广东

李兴韵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雨与中土

1922年学制改革与广东

李兴韵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雨与中土：1922 年学制改革与广东/李兴韵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5222 - 5

I. ①美… II. ①李… III. ①学制—教育改革—研究—广东省—1922
IV. ①G527.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330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李 林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88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言	(1)
一 研究背景	(1)
二 研究现状	(3)
三 潜力与方向	(12)

第一篇 启动与采纳

第一章 新学制系统草案与广东	(17)
第一节 广东省教育会学制提案的出台	(18)
第二节 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与广东	(39)
第二章 三大会议与1922年学制的决策	(53)
第一节 学制改革与北京高等教育界的派分	(53)
第二节 教育部学制会议	(78)
第三节 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与1922年学制的颁布	(95)

第二篇 制度与实施

第三章 1922年学制与国立广东大学	(113)
第一节 文化争胜与筹建国立大学	(114)
第二节 学制变更与高专升大学	(122)
第三节 广东高等教育界的统一与国立广东大学变制	(133)
第四节 整合与提高	(142)
第四章 1922年学制与广东初、中等教育	(149)
第一节 政府主导与学级改革	(150)

2 美雨与中土

第二节 教育理念与学校改制	(159)
第三节 社会变动与学制改革	(184)

第三篇 反差与困境

第五章 期待与失落	(203)
第一节 自由化与教育宗旨的统一	(203)
第二节 升学与就业	(207)
第三节 贵族化与平民化	(217)
第六章 乡村教育	(224)
第一节 城乡之别	(224)
第二节 校乡之隔	(230)
第三节 无可奈何	(234)
结语 美雨与中土	(239)
附录 晚清民初学制沿革	(254)
主要参考文献	(259)
后记	(268)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回溯中国近年来学制改革的热潮：专科学校纷纷升为本科，单科性高校合并成立综合性大学，中等职业学校、中等师范学校逐渐被撤销和消失，义务教育的推广并逐渐实现免费教育，对乡村教育的思虑，还有更早一些时候小学改为六年制，课程突破学科界限的改革……就会发现种种现象并不陌生。这些正是九十余年前学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岁月荏苒，教育变革的历史似乎正在重演。细细探究，一些支配教育走向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仍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

20 世纪伊始，中国教育就走上了颠覆性的变革之路。晚清新政，教育变革是重大要项之一，而学制改革是其中具有彻底性和持续影响力的关键措施。1902—1904 年，清政府颁布了模仿日本的教育体制而建立的壬寅癸卯学制。仿佛是一夜之间，从国外引入的现代学校体系彻底取代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成为国家教育系统的正宗。书院纷纷停办或改为新式学堂；私塾虽数目庞大散布各地，却一直处于教育体系的边缘位置，遭受或被改良或被取缔的命运。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不是由古代学制逐渐演变而来，而是向西方借鉴，希望以他山之石收改进之功。在中国教育界一次又一次的外求后，信赖 1912 年创建的民国，并努力想建立一套适应共和政制的民主教育制度的中国教育家们将眼光投向美国，选择了当时在美国兴起仅数年的“六三三制”作为 20 年代初全国新学制改革的蓝本，这一改革的成果就是 1922 年学制。它是民国时期正式颁布的最后一部整体性学制，施行时间长影响甚广，成为近代教育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美雨飘至中土，源于欧战中美国地位的上升，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理论

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扩大和留美学生在中国教育界势力的大增等因素。但是在1922年学制的决策和实施时,面对的是一个比晚清民初学制变革时更复杂的教育体系: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留存,晚清建立起来的仿日的学制,民初仿照德国学制的部分变革,正在不断宣传中的美国学制,得到一些著名教育家支持的法国学制……各种制度叠加交错,各种观念时有交锋,各方派系常生纠葛,中国教育界的多重纠缠、多面复杂的情形,都在1922年学制的决策和推行过程中展现出来。以之为研究对象,可带出丰富多彩的相关史事,进而探测民国教育界的众生百态,以及描绘近代以来“外来”与“本土”因素交相作用下中国教育变革的复杂状况。

清末民初的两次学制改革都以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制定颁行为主,相较之下,1922年学制改革有很大不同:它在全国教育界讨论和征求意见,得到美国教育专家的支持和帮助,由教育团体先行讨论,在一些省区开展了专门的研究讨论和试办实验学校,官方与民间意见最后达成一致。所以在新制改革之初,政府和教育界普遍认为它是能帮助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好”制度而合力广泛推行。但推行开后却陷入种种困境,屡遭批评。1922年学制是以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思想作为基本指导思想,以他的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作为教育变革的目标,但以杜威教育理念构建的新学制在中国的推行中却使得教育贵族化、学校脱离社会、强化升学等弊端更加明显。义务教育的年限一再缩减却依然无法实现,新式小学竞争不过被政府一再压制的私塾;中等教育中本想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选科制、学分制反被批评降低了教育质量,本为改变旧制中学偏于升学弊端而力求兼顾就业的综合中学却强化了升学的倾向。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打破了教育界以杜威理念谋求变革的迷梦。但是,大半个世纪过去,强化升学、贵族化倾向、乡村教育的出路等问题,至今仍是中国教育难解的症结。教育变革的成效非短期可见,在今天,反观这段历史,不仅有利于展现和讨论民国教育界广受关注、民国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了解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确立过程的曲折,还能从中获得启发,对当下的教育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迪。

近代学制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近代教育变革明显而有力的反映,学制改革也一直是教育界关注的焦点。在20世纪20年代的学制改革中,各类教育刊物均登载很多讨论学制改革的文章,甚至出版专号,前人研究也多从这些资料入手,集中在学制条文的解释和教育思想的阐发。这样的做法

虽然有利于后者把握近代学制的基本变革和发展趋向,但常因偏重共性而忽略大同之下并非小异之处,偏重典章而忽略制度的落实情况,偏重条文呈现的结果而忽略制度出台背后之“人事”,偏重教育学意义上的得失评价而忽略此一变革中蕴含的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宏大命题。在这样的研究下,一些重要的事件和环节常因与后见之明的结局不同而被剪裁掉,如与1922年学制出台相关甚深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和教育部学制会议,前者几乎无人提及,后者也多被一笔带过。所以首先应做笨工夫,致力于史料发掘和史事考订,通过史料的相互参证重建史实。当然,这样的方法作用下所展现的情景和得出的观点,往往与前人的研究和通常的印象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各异,如以全国为研究对象,则失之过宽,为了明晰1922年学制具体的落实情况,本书选取广东为研究对象,其原因有三:首先是因为广东与1922年学制的制定密切相连。1921年,正式讨论学制改革的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广东召开,大会在10省学制提案中选广东省的学制提案,以它为底本起草和通过了新学制草案。1921年秋成立的广州执信学校是全国第一所试行新学制的学校,奠基之功,甚为重要。其次是因为广东这一时期的特殊地位。作为公开独立于北京政府的省份,虽学制改革的大方向一致,但广东的新学制改革自有独特之处。最后,随着北伐,国民党政府在广东制定的教育政策被扩展到全国,广东的学制改革也就涉及全国学制的走向。

这是一个穿越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课题,但并非是要以当代人的角度重新书写当时人的历史,而是希望深入更多具体的过程,探询更多细节的问题,加深对1922年学制改革真实情况的研究和把握。如果在此基础上,能对当下的教育变革多几分体悟和借鉴,则是摘瓜带豆,亦有可喜。

二 研究现状

学术界关于此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如下:

(一)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1922年学制制定前后,中国教育界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教育杂志》《新教育》《中华教育界》等教育刊物都连续刊载相关文章,出版专号,各省教育会也在自己的会刊上展开讨论,对新学制的理论基础、学级

构成进行分析评论,对新学制的施行作经验介绍,对新学制将为中国教育界带来的改变做预测估计。这一时期各种报纸杂志上的广泛讨论都是本文研究最基本的史料。由舒新城编辑、中华书局 1928 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也收集了一些关于 1922 年学制的基本史料,如湖南省学制提案、广东省教育会在第七届教育会联合会上的报告、北京学制会议的记录等。^①《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学校系统”一节概述了新式学堂出现后到民国 22 年(1933)这段时间里,中国历次的学制改革缘由、系统图及其说明、制定的过程等。从这些史料的整理可以看出 1922 年学制大概的缘起、规划、讨论过程,规章制度的确立变化,以及部分地区实际施行后的调整反馈情况。

1927 年,陈宝泉的《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史》出版,这是第一本研究中国近代学制的著作。陈宝泉将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划分为“无系统的教育时期、钦定学堂章程时期、奏定学堂章程时期、民国新学制颁布时期、学校系统改革案时期”五个时期,以各个时期主要的学制章程变化为主体,内容上是“详于中央略于各省”^②,此书的学制划分体例多为后来的研究者沿用。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时期开始推行的学制改革案和 30 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学校法令使得教育界对学制的关注增加。这时,教育理论界出现了对中国近代新教育反思的潮流,研究者们力图从历史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所以关于教育史方面的研究著作增多。1931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中关于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篇文章都以学制改革为线叙述其发展的历程,较早对各级学校教育的阶段、特点进行了总结。同年出版的蔡芹香的《中国学制史》一书篇章安排条理清晰,其特点在于没有停留在史实的叙述上,而是在最后对民国以后的教育趋势、历代学制的缺点做出总结,对其后学制发展的方向提出自己的意见。周予同 1933 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书将 1922 年学制和民初学制放入一章叙述,而将 20 年代末国民党统治下的学校制度另列为一章,此种划分对判明 1922 年学制的性质很有提示作用,而且此书是较早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学校制度做出归纳总结的。姜书阁 1934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关于学制的部分体例基

① 1933 年该书重版,舒新城在此版中增加了“党化教育”的内容。

② 陈宝泉:《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史》,文化学社 1927 年版,凡例。

本沿用陈宝泉一书，论述也不超出陈书的水平。但作者在自序中谈到“中国以三十年的工夫办欧美各国三个世纪所办的教育，成绩不佳，自在意中；而制度之杂乱，亦为不可免的”，“（教育）制度地频繁的变更”是教育成绩落后的直接原因。在当时一片对学制改革、对教育状况不满的声音中，这是少有的较为宽容的看法，指出弊端在于中国教育界的急于求进。

关于对中国学习外国学制的反思，雷沛鸿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社会基础，指出盲目引进西方学校教育制度与传统中国教育只有少数人垄断、与普通社会相分离的状况无异。他对1922年学制也从社会基础角度进行了分析，以义务教育程度为例说明其并不适合中国。^①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第一任主任庄泽宣在其《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一书中也指出中国教育界“把旧的丢了，把新的搬过来，这种新教育并不是经过一番研究融化而成的，只把制度改改罢了”。^②

（二）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

张正藩1964年出版的专著《近卅年中国教育述评》一书虽基本上是对抗战后教育情况的研究，但在该书“六十年来中国教育的演变”一篇中提到了1922年北京教育部的学制会议，认为这次会议“显示出一个国家新的机运的开始”。孙邦正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教育》（1971年）较有代表性，作者主要还是用政府颁发的成文章程为主线叙述从清末到20世纪60年代各类教育的发展史（1949年后是限于台湾地区），但他注意到民主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潮在20年代教育变革中的影响，而且对在前人研究中少有涉猎的大学制度变化也有论及。孙邦正在1973年又出版了专门讨论学制的《中国学制问题》，不过多数是谈及现实学制问题，对民国学制的研究没有超过前书。1973年，台湾“教育部”组成了学制改革研究小组，邀请学者专家对台湾现行制度的优点、缺点加以检讨，有计划地规划出未来教育发展的蓝图，其后对学制的研究增多。1984年，该小组的研究成果被编辑为《中国学制改革之研究》出版，其中多数是对现实学制的改革意见，少数几篇涉及民国学制史的文章都有强烈的借古鉴

^① 雷沛鸿：《中国教育之新要求》《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合流问题》《整个教育体系的演进》《现代中国教育的两宗疑案》《中国过去的普及教育运动》，载韦善美、潘启富选编《雷沛鸿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118页。

今的倾向。

以上是台湾地区的研究情况，大陆地区因为1922年学制的“六三三”学籍系统是仿自美国，所以“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认定为盲目抄袭美国学制而被否定”^①。到80年代，一部分研究者仍继续此说^②，但同时也有大陆学者开始积极评价新学制的意义，如金林祥的《评“六三三”学制》（1983年）一文从该学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考察，认为它的产生是为了适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对国外学制的经验也是采用分析的态度，并非是盲从美制。这一见解注意到了学制改革的教育背景之外的原因，而且肯定了中国教育界的主体意识。此后，关于1922年学制在历史上所起作用的主导方面是积极的观点在相关的文章和教育通史中得到加强。^③

80年代以后，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取得进展。198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桂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书，此书因是教学参考书，取材范围较窄，但其中有一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教育”专门辑录了1922年学制的基本史料，另一章“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也有学制演变的内容。从1983年开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朱有瓚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丛书，该丛书收集了同文馆成立到1922年学制公布期间的学制史料，取材范围扩展到报纸杂志、地方志、文集、年鉴、校史和文史资料，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过因为时间下限基本是到1922年，所以在新学制施行方面的资料就较为缺乏。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近代教育史的研究突飞猛进，资料编辑有了明显进展。1990—1994年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六卷本丛书，吸收了已有的各种近代教育史资料的成果，并且将时间扩展到整个民国时期，其中《学制演变》分卷收集了近代历次学制改革的许多基本史料，《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实业教育 师范教育》等卷也有和学制改革相关的内容。

① 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

② 如苏渭昌《“六三三”学制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③ 如李桂林《评一九二二年的教育改革》，《东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1986年第3期；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同时,蔡元培、胡适、雷沛鸿、陶行知、廖世承、梁漱溟、俞子夷等民国时期学界人士的全集、文集、教育论著选集的相继出版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关于1922年学制的研究进展明显,特别是在学制制定的全国背景、召开的历次教育会议等研究方面。钱曼倩、金林祥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1996年)阐明了中国近代学制的过程,详细分析了其内容,是目前最为详细系统的近代学制研究成果。该书对近代不同时期的三个学制进行纵向比较,突出了以学制改革为特征的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及特性。在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上都较前人研究广泛和深入,收集了许多报纸、杂志、文集资料。但是此书带有编著性质,在纵向范围是近代三部学制,横向范围是全国上下,有利于明晰学制变化过程但也使得它稍显宽泛。

民国教育史整体情况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为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1997年),该书从多学科联系的角度,将学制的变化调整置于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对1922年学制诞生的背景、过程、调整做了详细分析,认为“就总体而言,这是一次力图与国际教育和现代化趋势接轨的,比较成功的学制改革”。同时又从“学制引进与教育精神的择取、学制引进与两种知识体系的互补、学制改革与政治的关系、学制设计与综合国力和社会需求的关系”四个方面初步对学制处在理论与实践、中外文化冲突、理想与现实中的困境进行了总结。不过该书从1922年学制的制度分析一下跳到1928年的改革,恰好忽略了制度实施的关键环节。同时,随着教育史研究范围的拓展,一些相关专著的出版丰富了对1922年学制的研究。宋恩荣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丛书,选取了近代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教育家进行了研究,其中黄书光所著的《胡适教育思想研究》(1994年)一书大量采用了胡适日记关于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记载,对当时会上代表们的不同主张有所反映。吕达的《课程史论》(1994年)一书对中国从鸦片战争到1922年间普通中学课程的渊源与改革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作者提出广东和1922年学制的酝酿改革密不可分,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壮大的缘故”,不过当时许多省份都提出相似的学制草案,广东和1922年学制的渊源还应进一步分析。周谷平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1996年)对1922年学制的优点、缺陷都作了概括性评述,她注

意到该学制废止了教育宗旨，代之以七项标准的突出改变，并且很明确地指出这一转变和 1919 年第五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的“废止教育宗旨案”，以及与杜威理论影响的密切联系。在此基础上，此一改变的深刻含义还可进一步分析。张伟平所著的《教育会社与中国教育近代化》（2002 年）中有一章专门论述了教育会社与近代学制演变的关系，通过对壬寅·癸卯、壬子·癸丑、壬戌三个近代学制产生过程的分析，展现出教育会社在学制产生方面所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强调了教育会对 1922 年学制设计和出台的决定性影响，并提出了 1922 年学制的积极意义。该书对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也注意到广东省教育会后来继续新学制研究的措施，但在主要引用资料和认识上还是没有超过《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王伦信的《晚清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2002 年）一书对 1922 年学制中变化最大的中学制度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并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在社会教育方面的巨大差异，对中国引入美国综合中学造成的困难进行了分析。小林善文的《中国近代教育的普及和改革研究》（《中国近代教育の普及と改革に関する研究》，2002 年）大量采用《时报》登载的消息，这在 1922 年学制的相关研究中颇为少见，大大丰富了研究的史料。另外该书对中等教育阶段的研究采用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实验新学制的报告，对中学选科制、教育费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美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此阶段教育史学界已多有关注。谢长法的专著《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2002 年），卢浩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近代教育模仿美国的主要推动者》（2003 年），张雪蓉的博士学位论文《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1915—1927）——国立东南大学为个案》（2004 年），分别以留美学生这一群体、中华教育改进社这一教育机构、东南大学这一个案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美国教育思想和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上的重大作用。以上研究除了给本文的研究提供大背景的基础外，其中直接与本文相关的有《借鉴与融合》中涉及留美学生与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与新学制改革运动的关系，不过作者主要是列出一些留美学生，如胡适、廖世承、陶行知等人发表的学制改革的观点，以说明 1922 年学制的颁行“与留美学生在教育界领袖群伦的作用休戚相关”。但事实上，非留美学生也发表了大量关于学制改革的文章，留美学生的重要地位不能只

从他们的言论上加以证明，更应在学制决策的采纳过程中体现。《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一文专章讨论了美国以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派和东南大学学衡派对杜威实用主义的批评，这是以往的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

与1922年学制改革关系最为密切的外国教育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教授杜威（John Dewey）和孟禄（Paul Monroe），对于他们的研究也在逐渐增多，出现了多篇论文和专著。刘会的《〈壬戌学制〉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1994年）一文讨论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团体的影响，并将他的教育理论与壬戌学制的标准和特点进行了比勘，明确了杜威思想影响1922年学制的程度。元青的《杜威与中国》（2001年）一书通过杜威五四时期中国行的典型个案研究，深入探讨了杜威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构建出杜威学说与中国二三十年代社会变迁、政治变动、教育改革和学术引进等方面的关系，其中第四章全面阐述了杜威对20年代中国教育的影响，详细分析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新学制中的具体体现。关于孟禄的研究则有以下论文：日本学者阿部洋的《保尔·孟禄与中国的近代教育》（1996年）一文围绕孟禄与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界的关系进行探讨，其中“孟禄的学校调查与《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部分通过对孟禄在华活动的梳理，指出通过在北京的讨论会和参加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孟禄对1922年学制改革的实施产生了巨大影响。陈竞蓉的《孟禄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教育》（2004年）一文，通过对孟禄1921年来华讲学的缘由、对中国教育理论的指导、对1922年学制的贡献、对中国教育实践的指导四个方面的分析，总结了孟禄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产生的深远影响。该作者2004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孟禄与中国近代教育》是目前为止对孟禄中国之行研究最详细的文章，其中有一章“孟禄与《壬戌学制》”专门总结了孟禄对1922年学制的主张和贡献。李兴韵的《杜威、孟禄访华与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派别纷争》（2007年）以杜威、孟禄访华为切入点，研究当时中国教育界各方力量的较量和势力消长，以及学人派分矛盾对近代教育制度变革的巨大影响。

另外，随着学界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一些看似非直接关联的研究对本书产生很大的帮助和影响，拓展了本书研究的思路 and 范围。张仲礼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1996年）中对东南沿海城市近代化历程的探讨有助于笔者从城市化发展对教育影响的角度关注现代学校制度

的兴起。李书磊所著的《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1999年）对河北丰宁县的乡村小学采取蹲点式调查，讨论了城乡二元性中现代乡村学校的困境，许多情况与本书涵盖的年代面临的情形非常相似，而作者对乡村教育是走“催生”还是“移植”道路的分析也很有见地。关晓红的《晚清学部研究》（2000年）从人事变革、人脉关系角度分析晚清癸卯学制的产生和执行过程，避免了教育史研究中偏重成文规章制度，忽略实际运作的缺失，在研究方法上很有启示和借鉴作用。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2001年）关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的论述，对了解和厘清1922年学制改革中北京教育界的复杂关系很有助益。张晓唯在《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2003年）一书中对蔡元培与胡适二十年携手合作进行了个案研究，通过二人的立身行事深入到民国的思想、文化、教育诸多方面。此书梳理了蔡、胡北大共事时在校务上的合作情况，提示二人在文化思想上都显示“趋向西化”，在教育观念上皆偏重大学教育，追求教育独立，为分析胡适在北大与蔡元培日益接近的原因、蔡胡二人在学制改革中的倾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王东杰的《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2005年），将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新辟大学校史研究路向的方法尤有新意。

（四）广东省近代教育发展的研究

1941年，广东文物展览会编撰了《广东文物》，分门别类地记叙了广东文化艺术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金曾澄的《广东之教育》一文指出广东教育办得不好的几个原因，即环境不安定、教育商业化、人事欠调整、研究指导工作过少，另外也介绍了广东各级教育的发展过程。曹思彬等编写的《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1983年）收集整理了近现代广州教育发展的相关史料，但资料引文都没有注明出处。何国华的《民国时期的教育》（1996年）是一本地方教育史志，第一次对广东民国时期的教育作了全面详细的梳理，记叙了三十余年间广东教育的变迁和发展，许多史料以前没有被注意到，较为丰富翔实。但可惜大多数资料引文没有注明来源出处，降低了该书的价值，也不利于后学者的继续研究。

具体到广东各级教育的研究，高等教育方面，关于国立广东大学的研究主要见于中山大学的相关研究著作中，有梁山等编著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1983年），黄福庆著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1988年）^①，黄义祥编著的《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1999年）。但对于广东大学是如何合并广东各专门学校、高等师范而成立一所多科性综合大学的转型过程，前书研究只是列出相关的命令规程，对其原因和过程语焉不详。初等教育方面的研究有黄佳蓉的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广东初等教育研究》，该文以小学和私塾两者力量的消长为线索，展现了民国时期广东初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其中对20世纪20年代广东政府转变教育政策，发展小学，对私塾采取改良与取缔并举带来的私塾小学化的原因和后果做了详细研究，并提出应该再慎重思考从西方引入的教育制度应如何进行“中国化”这一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难解问题。

一些关于广东省政治、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也扩充了本书研究的相关背景。著作方面，李绪柏的《清代广东朴学研究》（2001年）一书对了解广东文化传统很有帮助。周兴樑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2001年）一书中，有三篇文章对民初广东的教育改革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东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做了专门细致的研究，有利于了解近代广东教育发展的情况和一些重大事件。《广东高等教育发展史》（2002年）全面介绍广东从古代到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为了解广东高等教育界的整体情况提供了参考基础。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政治、文化与阶级》（*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②，1996）、曾庆榴的《广州国民政府》（1996年）和深町英夫的《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2003年）三本书对20世纪20年代广东的政党体制、政府机构的研究都有助于把握广东的整体形势。论文方面，袁征的《1924—1927年广东教育的基本制度与史实》（2001年）整理了1924年到1927年三年间广东学校教育的一些基本制度和史实。该作者的另一篇论文《党化教育：近代中国教育的重要转折，1924—1929》（“The Partification of Education: A Pivotal Turn i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1924 - 1929”，2000）对国民党政府20世纪20年代在广东施行的“党化教育”政策的出现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具体讨论，提出“党化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转折的观点，这对理解当时广东

① 该书承中山大学袁伟时先生惠借，特致谢意。

② 该书承华南师范大学袁征教授惠借，特致谢意。

教育界的情形提供了帮助和借鉴。

三 潜力与方向

回顾 1922 年学制研究的相关学术史，可见现有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存在以下缺漏，而这正是尚需进一步关注的方向和重点。

一是完全采信个别当事者的说法，对材料的解读容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停留在文章本身或被作者误导。如在关于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研究中，胡适的《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新学制的经过》一文被多次引用和分析，研究者都采用胡适的一家之言，但实际上胡适的记述有不完整和可商榷之处。结合胡适文外的背景，事件过程亦非胡适所记那么简单。

二是重点关注大型教育刊物，忽视其他史料。研究 1922 年学制，《教育杂志》《新教育》《中华教育界》等教育刊物是近代教育史研究中的重要资料，从中虽然能了解到谁进行过什么样的研究，谁提出了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但只关注这一类大型期刊上教育理论的讨论和对教育政策的报道，易使研究仅仅停留在对制度条文的解读层面，继续的研究也是在几乎相同的角度评价下增加同性质的材料。所以，前人的研究虽已经有了从课程、教育思想、参与人员等方面的扩展，但有较明显的史料重复现象，而且结论式评价较多，显得单一化，难以分清彼此的贡献。同时，相较于主流的教育刊物，当时报纸上的大量报道评论却被忽略。报纸的立场、兴趣、利害各异，态度自然不同。各种报道有时点到即止，有时直白无碍，有时扑朔迷离，有些是事实，有些是猜度，有些是造谣生事，有些是道听途说，但事出有因，将各家报纸的报道进行前后和相互之间的参照比对，对于了解新学制决策出台的背景原因很有帮助。

三是对参与人物进行研究的面太窄。1922 年学制改革是牵动全国教育界的大事，但受到研究者关注的主要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和留美归国生，其他参与其事者却被忽略，特别是新教育阵营外的群体在研究中鲜有人提及。但在实际中，政府和学校、公立与私立学校、校方和学生、大中小学、城市和乡村对新学制的态度是有差异的，不全面关注，就难以明白新学制在中国推行的基础、实际的环境、具体的困难，所以尚需把与学制改革相关的各方都纳入研究范围，尽可能地呈现相关活动的全貌和发展的